

晨起,查阅安庆风节井及风节井小学之资料,无意中发陈独秀先生曾参与创立我的母校——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(今安庆二中),亲自莅临视察,会同校方勘察选择校园地址,同时我还发现仲甫先生妻子高君曼之堂姐高晓岚也是母校校友,有新奇,也有激动。翻阅相关史料,于这段史实,也只见其时校长徐方汉受柏文蔚、陈独秀、邓绳侯委托创办省立一女师云云,一笔带过。故抄录民国安徽省立一女中二十周年纪念校刊《女钟》中的校长徐方汉之纪念感言为证。

“民国21年11月23日,省立第一女子中学20周年纪念,将举过往事、目前设施与今后之计,书录而为刊,而征文及于方汉,以方汉理校事久,义不可以无言也……回忆民元夏秋之交,方汉受邓绳侯先生之命,创办此校,时邓先生正司本省教育

◆ 安庆人物谱

陈独秀在安徽省立一女师

陈向东

事,中秋某日,先生约陈君仲甫及方汉相度校址,即今本校西偏一部寝室及教职员宿舍,旧为前清实业学堂,遭驻军摧毁,垣穿椳折,蓬蒿没人,三人者徘徊久之,此情此景,忽忽遂21年,邓先生久归道山,而当时校中共事诸君,亦多物化,追维前迹,能不怆痕。”

翻阅中共安庆市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《独秀简影》,有记载,1912年6月,陈独秀应安徽都督府都督柏文蔚之邀请,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,和徐方汉追述的仲甫

先生在1912年秋勘察安庆二中校址时间相吻合,和校史记载的受柏文蔚、陈独秀、邓绳侯(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之祖父,民国皖省教育司司长)的情节基本相符。“垣穿椳折,蓬蒿没人,三人者徘徊久之。”读来令人喟叹唏嘘,其中邓绳侯还拖着病躯,(翌年病故)。陈独秀等先贤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倡导男女平等、女性独立自由,开设女校,为女性谋求受教育机遇,促进社会进步之远见、情怀跃然纸上。

徐方汉(1875—1952),字皋浦,

庐江县人,先后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,日本东京明治大学。归国后,于1912年创办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,担任首任校长,历时达10余年。由于其励精图治,勤勉治校,学校成为民国皖省名校。徐方汉先后任安徽省参议员、省教育厅视察、省教育会会长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皖北人大会代表、政协委员,遗著有《唐宋八大家集》文稿等,现已失传。

皖城民国才媛、曾入读于安庆一女师的陈独秀之妻高君曼堂姐高晓岚,先后任安徽省立一女中教务主任,安徽省立二女中(芜湖)校长。其朋友圈明星荟萃,有苏雪林、庐隐、韦素园等。她曾为母校赋诗:

“白花亭畔春风里,十二人同读史经。多少及门贤姊妹,而今光大旧门庭。中原戎马仓皇日,学海波涛澎湃时。经略文章卫社稷,先鞭速著莫迟迟。”

◆ 凡人素描

母亲记账

李梅

现年八十二岁的母亲,每天还保持着贯穿一生的好习惯——记账。

古话说的好: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”母亲把每天的开销,小到一把葱一头蒜,大到存款、买房子的费用,都用练习本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。一日一小记,十天一统计,一月一汇总,确保精确地计算出每月家庭收支情况,从而再算出每年的消费额结余款,清晰明晓家庭开支。

母亲每天买菜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戴上老花镜,拿起笔,对照物品赶紧记账,时而写写停停,时而又口中念念有词:“六六三十六,八九七十二……”

日积月累,母亲的记账本已经累积到可观的地步。近期的记账本,都被母亲标上年月日,按时间顺序,整整齐齐地收在抽屉里;年深日久的记账本,也被母亲按先后顺序装在纸箱里,堆在墙角,即使落灰生尘,也舍不得扔掉。

得意于勤动手多动脑,母亲现在依然耳聪目明,头脑灵活。眼面前的事情,她搞得清清楚楚;对于四五十年前的事情,她也记忆犹新。

生于1940年代的母亲,其实没有真正上过几年学,后期经过夜校扫盲班的补习,才勉强达到“高小”水平。

那时家庭条件差,兄弟姊妹多,庄稼汉父母一般都会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家里的男孩子。远在淮南市的二姥爷

爷,上过学,当过兵,在城市里工作生活,耳濡目染中悉知穷则思变,读书才会有出路的先进思想,经常给我姥爷写信,告诉他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,请求他要着眼于未来,尽一切力量也要让我母亲进学校读书。

由于二姥爷

的偏爱,并省吃俭用不时寄些钱和粮票来补贴家用,母亲如愿上了学,开始学习加减乘除,“人口手足”。

母亲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,每天都兴奋地早早起床,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,走五里路去镇子上学。母亲上课时认真听讲,放学后用心练习,没有桌子,就在膝盖上看书识字,没有铅笔练习本就拿草木灰撒在地上,用树枝学写字。

渐渐地,母亲认识了很多汉字,能够帮有需要的人家读信写信了。在那个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时代,母亲成了村中老一辈人赞叹的女秀才。

作为家中老大,母亲是她父母最得意的小帮手,平常要帮着拉扯弟弟妹妹,农忙时节还要冲锋在前,抢种抢收多挣工分。一到农忙时节,上学就没有那么准时准点了,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
后来,村上办起了识字班,这是避开生产劳作时段,利用农闲时间去参加学习的扫盲运动,这让母亲又获得了一次学习的机会。为了扫除文盲,让更多的人认识生字,老师采用的是速成识字法,先教会大家正确使用注音符,遇到不认识的字,就利用新华字典,查读音和释义。

母亲在识字班里担任班长职务,还辅助文化教员教大家认字写字,是乡邻口中亲切的“小老师”。在煤油灯如豆般的光影下,一个个方块字被母亲一笔一划的书写出来。

生产队急需一个会打算盘的记账员来给每家每户记工分。母亲凭着一股子聪明好学的冲劲,立马就找人拜师学艺。一夜之间就背下了珠算口诀,学会打算盘,顺利通过生产队的考核,成了一个坐着就能挣工分的生产队女会计。

从那以后,母亲一直坚持“记账”。孙辈们喜欢观摩奶奶的记账本,常常对着她写的错别字,笑到肚子疼。虽然到了提笔忘字的年龄,但母亲还是保持勤学好问的作风,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身边的家人,在草稿纸上反复练习,直到能够准确无误地写出来为止。



老父亲

潘有刚 摄

◆ 流年碎影

岳西要通火车

何承朴

我每天早上打开手机,看我日夜思念的故乡《安庆晚报》报道家乡的信息。2月28日,得悉岳西将要通火车的报道,我兴奋不已。

1950年2月,我考进安庆皖北师范,入学后才知道是干部培训班。不久就分配安庆地委土改工作队,在“三步两桥”一幢大楼里,学习了一个多月,我们即分赴各县进行土改。我和舅舅邹声昶以及同学丁宪立被分配到岳西县。1951年1月底或2月上旬,我们背起背包,从安庆步行至潜山县城休息一夜,次日下午抵达岳西县城关衙前镇。在镇外即闻欢迎我们的锣鼓声,街口挂起的欢迎横幅迎风飘扬。我们沿着一边靠山、一边挨着小河的路步行至县政府大楼,次日听县委介绍情况,下午分配下乡。我分到大山深处的河口区。当我爬上高山眺望时,山外有山,天的颜色都像山色。我被分到山上的一个生产队。和我同组是一位名叫胡小荃的大姐,次日一早我们就背起背包爬山入队。胡小荃系岳西县从农村贫苦农民家中挑选出来培养的后备干部,老实、和善,身体健壮,比我可能大五六岁。初次见面她热情地喊我“小何”,说是今后要多帮助她。我说互相学习。胡大姐识字不多,可能进过农村扫盲班,和我住在一个极其贫困

的农民家中,每顿饭都是红苕饭,据说大米是县上配给我们土改队员的。房东姓余。有一天晚上,山上下大雪,滴水成冰,我们和余家人围在堂屋火堆旁取暖,背上有阵阵寒意,到炉火快熄,全家人各自回房休息。

胡大姐吃饭时,总是把米饭给我多盛些。她说新中国成立前她家有时红苕都吃不上,吃过树叶、野菜;收成不好时,交了地租,剩的粮食只够吃半年。一个月后,大队部要调我去大队专门写材料。我再三请求,上级领导同意我白天仍在生产队,晚上才回大队写材料。夏初,土改工作重点转入分配田地。我白天在生产队和胡大姐一起丈量土地,有时还脱了鞋子去水田丈量。河口区土改结束,区上评选先进,胡大姐极力推荐我,还在区评选大会上介绍我的事迹,称赞我是知识分子,诚心为贫下农服务的典型。最后岳西县评我为二级功臣。

在县城招待所我因即将离开岳西去望江县土改,胡大姐来看我,她对我说,“我们岳西人多么想走出大山,去看看外面世界,如果有一天能修一条直通安庆的公路多好。”

我和胡大姐分别已74年,不知她现在何处,但愿她健康尚在。她要是得悉岳西将通火车,该多兴奋!

